

关注

以彰显精神品格的艺术形象,礼赞劳动创造,致敬平凡奋斗

对话嘉宾:

王翠艳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授、院长
梁振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电视剧《春天里》总编剧
李喙洋 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副教授
主持人:许莹 本报记者

近年来,一批以劳动者为主角的影视作品脱颖而出。《山海情》《大江大河》《奔腾年代》《麓山之歌》《春天里》等作品以鲜活的劳动者形象为载体,生动镌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历程。值此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,本报邀请三位深耕影视创作与劳动影像研究的创作者、学者,共同探讨影视作品中劳动者形象的塑造与变迁,深入挖掘劳动叙事的时代价值,致敬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凡的劳动者。

——编者

将个体命运嵌入宏大历史

主持人:劳动者形象始终是影视创作关注的重要领域。作为新中国摄制的第一部长篇故事片,1949年表现铁路工人抢修松花江铁桥的电影《桥》,首次在银幕上正面展示工人阶级的形象。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《血,总是热的》《人到中年》,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《外来妹》《情满珠江》《车间主任》等经典作品,都为观众留下了历久弥新的劳动者形象。在各位看来,这些经典作品及其塑造的劳动者形象,为何能跨越时代、深入人心?它们在劳动者形象塑造上,有着哪些共通的特点?

王翠艳:正是这批作品在劳动者形象塑造上的成功赋予了它们跨越时代、深入人心的感染力。首先,这批作品的作者都有一线劳动的体验与经验,他们在创作时调动了自己真切的生活积累与情感记忆,就像鲁迅在《革命文学》中所写到的“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,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”,真实自有其力量;其次,作品中的人物达到了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”的艺术高度,不唯是生动的“这一个”,同时也凝聚了社会转型期人物命运的共性,具有厚重的内蕴;最后,创作者善于将人物置于结构性困境中深入展现其矛盾与复杂、困惑与纠结,这样的形象符合人性本真而易获得共情。

梁振华:这些作品之所以拥有持久的生命力,首先在于它们共同坚守了现实主义的立场。无论是《血,总是热的》还是《车间主任》,它们都没有回避时代转型的阵痛,而是在真实的矛盾冲突中展现劳动者的韧劲。这些形象成功将“个体命运”嵌入“宏大历史”。观众记住的不是某个完美英雄,而是敢于在僵化体制中突围的厂长,或是在琐碎日常中扛起责任的车间主任。他们在克服外部困难的同时,也在完成内心的跋涉与成长,这种将个人命运与时代进程紧密咬合的叙事,让角色跨越年代,至今仍唤起我们心中对于“把事情做成”的朴素敬意。共通之处在于,这些形象身上都有一种“抽气”——不投机、不虚空、坚实、有力量。英雄式的光环终会褪色,但在局限中依然选择前行的勇气,却能在任何时代都击中人心。

李喙洋:这些优秀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,是因为它们历经时间淘洗,成功塑造了兼具时代先锋性与平民人情味的形象,聚焦改革大潮中面对的各种困难和矛盾,全景式展现了改革时代的世风与人心。这些作品反映的是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实际情形,质感扎实,创作态度诚恳。就人物塑造而言,它们告别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“高大全”的造神式的人物塑造方式,呈现了改革一线坚韧的劳动者的高度责任感以及主人翁精神。

主持人:新时代以来,伴随产业升级、社会分工迭代,影视剧中的劳动者形象已从传统产业工人,拓展到科研技术人才、新业态从业者、新时代建设者等多元群体。您认为这些新时代劳动者形象,相较于此前形象,体现出哪些新的特质?近年来相关影视作品,在塑造新时代劳动者时,呈现出哪些共同的创作趋势?

王翠艳:影视剧劳动者形象从传统产业工人向科技人才、新业态劳动者等群体的拓展,呼应了我国制造业升级、服务业扩张以及新业态兴起的现实境况,是社会结构变革在艺术创作与文化叙事中的必然反映。据我观察,这些劳动者形象的塑造,呈现出三个新特质:其一是“知识型劳动”受到关注,作品不仅强调劳动者的拼搏奉献,同时也注重表现他们的创新精神。《大江大河》中的宋运辉、《麓山之歌》中的卫丞、《淬火年代》中的柳钧,都具有上述特点。其二是劳动者的“个体主体性”日益彰显,劳动者的拼搏精神既源于家国情怀,同时也与其渴望自我实现的职业理想息息相关。三是职业叙事和情感叙事高度融合。作品中的职业场景与职业细节更加鲜活,同时充分融入爱情、亲情、友情等情感叙事。

梁振华:如果说过去的劳动者形象更多是在时代转型的夹缝中负重前行,那么新时代的劳动者则是在技术变革的浪尖上重新定义自身。他们身上首先体现出了极强的“主体意识”。例如《春天里》的铁振国,从乡村闯入城市,他的“轴”与不服输,是为

了证明自己的人格与手艺能在陌生的城市扎下根。这种由生存压力倒逼出的强悍人格,是新时代劳动者的显著特质。其次,技能的专业性与人的全面发展被提升到了同等地位。这几年我们在创作中明显感到,塑造劳动者已不再单纯写“苦情”与“牺牲”,而是浓墨重彩地描摹他们精湛的技艺与智慧的闪光。创作趋势上,最核心的是从“仰视的颂歌”转向“平视的对话”。创作者真正走近那些“熟悉的陌生人”时才会发现,他们的故事远不止于奔波和劳作。他们用双手改变城市,也把城市里的见闻、观念和生活方式带回乡村;他们在进城与返乡之间穿行,连接着两种生活,也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变化。



《山海情》剧照

“深潜”“打捞”职业群体的独特思维与情感

主持人:新时代劳动者形象在精神内核、外在形象、职业叙事等方面,较之前发生了显著转变,这背后折射出我国时代发展与价值观念的深刻变迁。在这种背景下,影视创作应如何平衡职业真实与艺术表达的关系,既还原不同职业的专业特质,又避免劳动者形象陷入符号化、悬浮化的困境?

王翠艳:避免人物形象的符号化与悬浮化是任何创作都要解决的核心问题,劳动者形象的塑造尤其如此。首先要扎根现实,追求生活质感。无论是情节叙事、人物及人物关系设定还是场景设置,都要有生活质感的浸润。其次要有人性深度。不仅要展现劳动者的外部动作与行为,更要展现其内在的情感褶皱;不仅要刻画人与人、人与外部环境的冲突,更要呈现人与自我的冲突,也就是主人公灵魂在职业场域、让职业特有的矛盾与压力驱动故事走向。总而言之,要避免劳动者身份标签化,避免刻意煽情和强行拔高人物,避免剧作矛盾与职业处境脱节。

梁振华:这是我们在创作中面临的重大考验,也是我时常警醒的一点:拒绝架空和悬浮。平衡的关键在于“深潜”与“打捞”。职业真实不不仅是操作流程的规范,更是该职业群体独有的思维逻辑与情感表达方式。在创作《春天里》时,我和刘汀、张辉等编剧搭档在建筑工地与工友们同吃同住,才发现砌砖工、钢筋工不仅有过硬的技术规范,更有他们对待挫折与希望时极其鲜活的语言。要避免符号化,就必须在这些鲜活的语言和细节里浸泡够久。我们之所以把铁振国写得那样“轴”,把高中写得那样“拧”,并非为概念对立,而是源于采访中真实人性的启发。艺术表达要去捕捉劳动者在遭遇名利诱惑、人生磨难时那一瞬间的犹疑与坚守。只要我们把土壤里的根须挖得足够深,细节里的血肉足够饱满,呈现出的劳动者形象就自然带有行业的专业烙印,而不会沦为空洞的赞美诗。

李喙洋: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,弘扬主旋律的影视创作中不乏优秀的劳动者形象,但部分作品陷入了套路化叙事的困境:用刻意煽情的戏剧冲突制造感动,导致形象悬浮扁平,缺乏真实的生命力。

新时代的劳动者形象塑造,应当跳出模板化表达,回归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径:既要传递主流价值的正向引导,也要直面当

下社会的真实图景,回应职场生态的现实挑战,展现劳动者在时代浪潮中的机遇与勇气。《年会不能停!》《奇迹·笨小孩》等电影作品之所以收获青年观众的认可,正是因为它们以鲜活的叙事折射职场生态,让劳动者形象摆脱空洞的赞美,成为兼具专业特质与人性温度的立体表达。

新大众文艺助力劳动叙事广泛传播

主持人:当前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,受众审美多元化、传播方式多样化,这既为影视作品中劳动者形象的塑造带来了新可能,也提出了新要求。这一背景下,劳动者形象影视塑造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分别是什么?创作者应如何把握机遇、应对挑战?

王翠艳:当前新大众文艺的蓬勃态势,为影视劳动者叙事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前景。机遇层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,其一是文艺形态更为多元、生产成本更为低廉、传播渠道更为畅通、受众审美更为包容,这四个“更”使影视从业者拥有了更多的创作自由,也使其作品更能精准触达受众,从而有利于劳动叙事的广泛传播;其二是新媒体赋权使劳动者可以借助短视频、微电影、微纪录片等形式记录自己的生活,真正实现了从“知识分子代言”到“劳动者自我表达”的跃迁,劳动者的生活、情感和心灵由此得到最为真切的呈现。

挑战自然也是切实存在的,主要是新



媒体平台的流量导向会导致劳动内容的轻量化、娱乐化和猎奇化,快速的叙事节奏、强烈的戏剧冲突、对人物外貌与情感的过度强调等,都会消解劳动叙事的厚度与温度。

梁振华:机遇在于,传播方式的多样化打破了以往精英视角的垄断。那些默默无闻的群体,比如我们镜头下的建筑工人,正通过短视频、新媒体等渠道以更野生、更生猛的方式进入大众视野。这倒逼我们的影视创作必须拿出比现实更沸腾的故事来。挑战同样严峻。在碎片化、娱乐化的审美浪潮中,这类讲述汗水与坚守的慢叙事,很容易被流量所稀释。我们不应去迎合快消品式的感官刺激,而应利用多样化的媒介去构筑沉浸式的体验。创作者要做的,是像定海神针一样守住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,同时在形式上勇敢接纳新语态。让劳动者形象走进互联网语境,通过细腻的镜头,把工地宿舍、城乡路途上的那份厚重质感传播出去,让劳动者形象在多元审美中占据不可替代的“质感高地”。

李喙洋:新大众文艺丰富了劳动者的人物形象,也丰富了表达内涵的可能性。以前的影视作品中多塑造工人、农民,今天的劳动形态和职业身份更加多元化了,这些



这些劳动者形象打动人心

鲍秋吉(重庆市第六届劳动模范,重庆数酷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、技术带头人):

在众多现实题材影视作品中,我偏爱《山海情》《我在他乡挺好的》里那些并不起眼的劳动者形象,这些形象悄悄塑造了我对“劳动”二字的理解。

《山海情》讲的是一群最普通的农民和技术人员,在干旱荒凉的土地上,一点点把“黄沙地”变成“致富田”。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反复试验滴灌、调整品种,一次次失败,再一次次重来。那种“和命运死磕”的劲头,极致体现了劳动精神:条件再差,也要在自己的岗位上,把每一分力气都下在工作的推进中。后来,我带队做人工智能在农业、工业上的应用,每当面对环境恶劣、数据混乱、设备落后这些现实难题时,我总会想到剧里的这些人——既不浪漫化困难,也不向困难低头,而是扎实把问题拆小,分步骤解决。

《我在他乡挺好的》中那一大群“异乡打工仔”,没有宏大口号,只有地铁末班车、出租屋灯光下的勤恳与坚持。无论是外卖骑手、客服,还是写字楼里的年轻人,都是当代城市产业工人的缩影。对我触动很大的一点是:他们表面在“为公司打工”,本质上却是在为自己争取更体面的选择权。也正因此,我在团队管理中,会更在意工作时间的边界、公平的晋升规则和清晰的成长路径——尊重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付出,这是我作为劳动模范必须守住的底线。

如果说这些作品给我留下了什么最深的印象,那就是:劳动从来不是抽象的词语,而是无数具体的人在具体岗位上的具体坚持。他们有情绪、有脆弱,也有倔强和创造力。对我而言,这些影视形象带来的最大影响,是不断提醒自己——我所从事的数字科技与人工智能赛道,不在于概念有多新,而在于是否真正改善了一线劳动者的处境。我们做的每一次算法优化、每一次流程重构,最终都应体现在工人更安全的工作环境、更合理的劳动强度和更有尊严的生活上。

在这个意义上,这类题材作品既是镜子,也是标尺:它们照见了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劳动身影,也为像我这样的科技工作者指明了方向——无论技术发展多快,脚步都不能离开普通劳动者的土地。

栾玉帅(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,京东物流快递员):

我喜欢电影《铁人》,小时候就听家里人说过,铁人王进喜,铁人精神,后来看了电影,让我热血沸腾,还受到了很大启发。这部电影以老一辈石油工人王进喜为原型,真实还原了当时的恶劣环境,看的时候我感到很心酸,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

影片里最打动我的,就是王进喜和工友们那“不怕苦、不服输”的拼劲儿。没有先进设备,他们就用手扛手挖;没有足够的工具,他们就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水泥。王进喜喊出的“宁可少活二十年,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”,这话听着朴实,但那股子为了国家建设豁得出去的劲头,久久震撼着我的内心。他们把一颗心都扑在工作上,这种爱岗敬业、无私奉献的精神,是老一辈劳动者最真实的写照。

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快递员,看着《铁人》里的故事,我总觉得自己和他们有很多共通的地方。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比当年好太多了,但那份吃苦耐劳、脚踏实地的劲头不能丢。我每天骑着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,风里来雨里去,派送每一个包裹。遇到刮风下雨,因时效延误面临客户不理解的情况时,只要一想到王进喜他们在荒原上“啃硬骨头”的样子,我就觉得眼前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,必须坚持住,扛下来。

《铁人》这部电影让我明白,劳模精神不是凭空而来的,是从一代代劳动者的实干里传下来的。无论时代怎么变,岗位是什么,只要我们守住初心,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到极致,就是不平凡的。

李子禹(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,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加工中心操作工,高级技师):

作为一名投身高铁智能制造事业的产业工人,电视剧《铁马豪情的日子》给了我很大触动。剧中,老一辈铁路工人是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典范。他们面对民族工业的积弱与技术封锁,未曾退缩半步,从长辛店机车厂到祖国各地,他们用双手检修机车、以匠心攻克难题,在战火纷飞与艰苦岁月里点燃实业报国的奋斗火种。他们不畏艰险、无私奉献,秉持“当大工、修最准机器、造最好火车”的坚定信念,生动诠释了老一辈产业工人的不屈不挠与自强不息。这种直面困境不低头、扎根岗位肯实干的态度,深深影响着我,也让我懂得,劳动是攻坚克难的底气,坚守是成就不凡的根基。

如今我投身高铁制造,更真切体会到这种精神的传承力量。高铁从“引进、消化、吸收、再创新”,再到中国高铁领跑全球,背后是无数工程师、技术人员在实验室反复钻研、在生产线上精益求精的日夜深耕。他们紧盯精密零件公差、打破核心技术壁垒、筑牢质量防线,这正是新时代产业工人对铁路工匠精神的延续,是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与坚守。

我愿将《铁马豪情的日子》等优秀作品承载的劳动精神融入高铁建设岗位中,以青春为笔、劳动为墨,把个人成长与国家装备制造发展紧密相连。深耕技术、苦练本领,在平凡岗位上追求不凡,为中国高铁自主创新、装备制造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,做弘扬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的新时代劳动者。